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博士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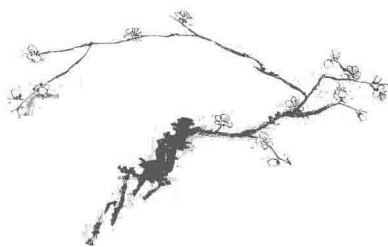
中唐文士的 身份认同研究

王雷 著

从中唐的社会历史语境着手、从思想史的纵向角度阐释中唐文士思想认同的状况，探讨他们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过程中，在焦虑困惑中寻找归属感、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情况。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库



中唐文士的身份认同研究

王雷 著

从中唐的社会历史语境着手，从思想史的纵向角度阐释中唐文士思想认同的状况。探讨他们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过程中，在焦虑困惑中寻找归属感、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情况。

中华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唐文士的身份认同研究/王雷 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622-7396-7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知识分子—社会地位—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D69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22346 号

中唐文士的身份认同研究

©王 雷 著

责任编辑:张银霞 刘沁怡

编辑室:高校教材编辑室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电话:027-67867076 027-67863040

邮购电话:027-67861321

网址:<http://www.ccnu press.com>

印刷:武汉鑫昶文化有限公司

字数:165千字

开本:710mm×1000mm 1/16

版次:2016年6月第1版

定价:20.00元

责任校对:刘 峥

电话:027-67867364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珞喻路152号

027-67861549

传真:027-67863291

电子信箱:press@mail.ccnu.edu.cn

督印:王兴平

印张:8.75

印次: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封面设计:甘 英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027-67861321

序

石云涛

每个人都有特定的身份和多重身份，无论是在社会、机构和组织中，还是在跨文化跨地域的空间内。身份认同（Identity）是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对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及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身份认同是对主体自身的一种认知和描述，包括很多方面，比如社会身份认同、思想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等等。

从文化角度讲，在个体认同的过程中，文化机构的权力运作促使个体积极或消极地参与文化实践活动，以实现其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是指文化主体在两个不同文化群体或亚群体之间进行抉择。因为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这个文化主体需将一种文化视为集体文化自我，而将另一种文化视为他者。自我身份认同（Self-identity）强调的是自我的心理和身体体验，以自我为核心。社会身份认同（Social-identity）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从个体认同到集体认同，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这类过程动态地描摹了身份认同的嬗变机制。在自成一体的部族社会，或天人合一的封建宗法社会，姓氏、血缘、性别等共同构成了牢固不变的身份认同机制。在更广泛的含义上，身份认同主要指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并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其显著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主体体验。本书作者认为，在全球化与后殖民语境中发生了身份认同问题，同样在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中，在新旧文化交替过程中也会发生身份认同问题。中唐是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那时社会刚刚经历了巨大的动乱，儒学和道家作为主导思想的思想文化格局动摇了，新的主导思想尚未建立起来，作为社会文化精英的士人们不能不陷入某种程度的茫然而不知所措。大乱夷平后的社会现实存在的诸多问题使他们困



惑，使他们焦虑，使他们在困惑和焦虑中寻找自己的归属感，寻找自己的社会身份归属。由此造成中唐时期特定时代的焦虑和不安，这种认同的焦虑影响到这一时期士人们的政治和文化立场的新的抉择。从这一思路出发，提出中唐士人身份认同的课题进行研究，对于认识中唐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深刻变化无疑是一个新颖的视角。

中唐文士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其经历、官职、地位、命运各不相同，但他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其个体身份、社会身份、政治身份、文化身份、思想倾向有共性又各不相同。作者是在肯定中唐文士个体差异性的基础上论述中唐文士的身份认同的。本书先从权力与历史的外围背景阐释了中唐文士的身份认同是如何产生的，然后分别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论述问题：从中唐文士的社会属性出发阐述了其社会身份认同；以中唐文士自我主体性体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剖析了其在思想史中的自我身份认同；从文化身份认同的角度讲，无论是中唐文士个体与某一特定文化的认同，还是文士群体在不同文化之间进行选择，都属于文士主体在中唐历史文化语境中逐步确认自我文化身份的范畴。作者认为，当历史有了某种断裂，主体才会产生认同危机，才会产生重新建构身份的需求，而身份认同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又与权力格局的变动息息相关。本书中对中唐文士身份认同的探讨，既有宏观的群体共性的把握，也有个案细致入微的分析，层层剥笋、逻辑严密，显示了作者对中唐这一急剧变革的时代脉搏和生活在这一时代的知识阶层政治立场、文化倾向与心态情感的准确把握。

王雷毕业于河南许昌学院，那是我曾经任教的一所大学。她毕业后依然积极进取，孜孜不倦地学习，又考入三峡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她要报考我的博士生，我的朋友向我推荐她，说她悟性好而且特别勤奋。在上大学时她曾远赴北京，到心仪的大学里蹭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读博期间，她心无旁骛，以学术为志业，大量时间是在学校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中度过的。她有自己的学习规划并能按照规划严格执行，她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之高甚至达到了苛刻的地步。把读书做学问当作人生乐趣的人，一定会不断进步有所提高的。正像我希望的，她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和毕业论文的写作，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实现了在高校任教的梦想。王雷对人生有自己的感悟，她说世上的人分三重境界：第一重的人很幸运但却是极少的，永远一帆风顺，任何挫折都不必遭遇，始终保持初心不变；第二重是由最初的善良演变为以恶制恶，为



社会境遇所左右，最后陷于平庸或不堪；还有第三重境界，哪怕经历过炼狱般的劫难，依然会选择善良与温和，保持接纳与宽容天地万物的最为平衡与淡然的心态，那是圣贤的境界。她坚定地选择第三重境界，立志向圣贤学习，做到口中有德，目中有人，心怀谦敬，力行善为，不断地修行，历练自我。她在毕业后进入高校任教，秉承“欲做好学问先把做人这关修好”的信念，认真做人，认真从事教学与科研，我深信她会在学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中唐文士身份认同的背景	14
第一节 中唐的权力话语场	14
一、经济权力	14
二、军事权力	15
三、政治权力	17
四、意识形态权力	18
第二节 中唐社会历史语境中文士的身份意识	19
一、藩镇割据带给文士的负面冲击	19
二、党争之中文士的身份意识	21
三、权宦淫威之下文士身份的尴尬	23
第二章 中唐文士的社会身份认同	27
第一节 中唐文士社会身份认同的焦虑与生成	27
一、危机意识与身份的重新定位	28
二、权威是认同的前提	30
三、文士的主体性及其社会身份认同	33
四、文士社会身份认同的流动性	34
第二节 中唐文士社会身份认同的表现	37
一、家国一体的社会责任感	37
二、理想主义的实践者	39
三、与权力话语联手的自觉	40
四、兼济的人文情结	42
五、志行高洁的功成身退者与遗憾的半官半隐者	43
六、个体生命与诗文创作的不解情缘	45
第三节 皇权统摄下中唐文士的政治追求及命运	48



一、仕宦的途径及其艰辛	49
二、中唐文士积极仕宦的心志	52
三、官僚系统中文士命运的不确定性	53
第三章 中唐文士的思想认同	58
第一节 中唐文士的文学思想认同	58
一、大历诗人在文学思想上的认同	58
二、文风文体革新的必然性	60
三、诗歌创作的新变与诗歌思想的刷新	65
第二节 中唐文士关于“天命观”的思索	71
一、传统的哲学命题与传统的官样文章	72
二、个体生命的启示录	73
三、“天人不相预”与“治乱在人不在天”	76
第三节 儒学复兴与中唐文士的思想认同	81
一、复兴儒家思想的针对性	81
二、新春秋学派对儒家思想的认同	84
三、古文运动群体复兴儒学的努力	86
四、当思想遭遇权力的同化	90
第四章 中唐文士的文化身份认同	94
第一节 中唐文士视域中的佛教文化	94
一、跨文化交流的必然趋势	95
二、对佛教文化的理性审视	97
三、在佛教中寻求儒家文化危机的解决方式	102
第二节 中唐文士的文化反思与文化认同	105
一、中唐纷繁的文化现象及其根源	105
二、中唐凸显的文化问题与文士的文化反思	109
三、中唐文士文学价值观念的变化与文化认同	112
结语	116
参考文献	122
后记	132

引言

一、问题的提出

中唐不仅是唐代享国二百九十年的中枢，亦是中国整个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形态、思想、文化表现等发展的转折。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期说”，将从中世到近世前期的过渡界定在唐代中期^①。美国汉学家包弼德虽然对“唐宋变革期说”进行了质疑和反思，但他也承认这样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安史之乱导致了一场制度上的危机”，“这场叛乱及政府在彻底恢复中央集权上的无能，与一场更深刻的文化与文章危机相连”^②。他认为公元755年到9世纪20年代的中唐是一个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③。清代诗论家叶燮说：“吾尝上下百代，至唐贞元、元和之间，窃以为古今文运诗运，至此时为一大关键也”，“此‘中’也者，乃古今之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独得而称中者也”^④。柳诒征提出：“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综而观之，无往不见其蜕变之迹焉。”^⑤ 尽管学者们对中唐精确的时间起止并没有一个共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唐是一个剧变的时期，是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在整个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是特殊的。而且这点已经被学术界所公认，这正是笔者论题的出发点。

盛唐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然而“礼仪之邦”“繁华之乡”背后

① [日] 内藤湖南：《中国史通论·绪言》，夏应元，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② [美]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4页。（后文同此版本）

③ [美]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第118页。

④ 叶燮：《已畦集》卷八《百家唐诗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二百四十四·别集类》，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

⑤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第478页。



所隐藏的危机在历经长达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后，最终全部昭显。战乱的创伤不会随着战乱的平息而愈合，战乱所引发的种种危机与祸患蔓延在唐代以后的岁月中，无法根除。郭子仪在给朝廷的上书中记述了亲历的惨象：“夫以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①安史之乱成为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中的历史大事件，之后中唐登上历史舞台，告别了昔日的荣耀，形成了不同于盛唐的一个断裂，也最终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转折的关键。

《新唐书·藩镇魏博列传》记载：“安、史乱天下，至肃宗大难略平，君臣皆幸安，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护养孽萌，已成祸根。乱人乘之，遂擅署吏，以赋税自私，不朝献于廷。效战国，肱髀相依，以土地传子孙，胁百姓，加锯其颈，利休逆污，遂使其人自视由（犹）羌狄然。一寇死，一贼生，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②安史之乱既是唐代藩镇问题的结果，又是使藩镇更难以被中央政府所操控的诱因。藩镇把辖区当作自己独立的小王国，自行任免官吏，赋税自充府库不向中央政府缴纳。藩镇首领将土地、财富、兵权等传给其子孙后代，特权世袭，盘剥压制百姓。其中最难驾驭的是河北三镇，他们不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直至唐朝灭亡的百余年，藩镇内部、各藩镇之间围绕权势利益进行的斗争与混战依旧连绵不绝。中央权威受到挑战，文士们在反思社会问题的同时，也从不同方面提出了解决方案。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文士的身份认同都与社会的变迁息息相关，在中唐这一关键性的历史转折时期，文士对自我身份进行重新审视与重新建构的问题也就更为明显。

六朝时期曾经操纵了社会特权的世家大族已经日薄西山，逐渐退出权力的中心地带。唐代的科举取士使大批寒门学子可以进入统治阶层，进而遨游宦海，这无疑是个致命的诱惑。新兴的寒门地主阶层开始登上历史政治舞台，这必然会形成一个新的利益集团，在皇权与士族特权之间寻求生存的空

^① 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二十《郭子仪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49页。（后文同此版本）

^②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百一十《藩镇魏博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517页。（后文同此版本）



间。唐代宗“仁孝温恭，动必有礼，幼而好学，尤专《礼》《易》”^①。唐德宗“天才秀茂，文思雕华。洒翰金銮，无愧淮南之作；属辞铅槧，何惭陇坻之书。文雅中兴，夙高前代，《二南》三祖，岂盛于兹”^②。唐顺宗为太子时“喜学艺，善隶书，礼重师傅，见辄先拜”^③。正可谓“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④（《孟子·滕文公上》）。行卷之风在中唐愈演愈烈，虽然不同个体的具体情况不可一概而论，但很多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卷入不同的派系、不同的集团，这不仅影响了文人们的命运与创作，而且成为中唐一个无法回避的社会顽疾。这与最高统治者重视诗文并以身躬行是分不开的。然而科举及第的文士大多在艺文方面有所专攻，吏治才能却稍逊一筹，这时不正常的文学盛行之风的弊端也就显现出来了。

无论朋党之争是“君子之朋”还是“小人之党”，它都是令最高统治者不安的因素。朋党是个复杂的盘根错节的政治现象，其背后的缘由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概括的，与之相关的事件亦是不胜枚举。但说到底，“朋党主要是指统治阶级内部具有不同政治背景和经济利益的对立的政治集团”^⑤。就其难以调和的矛盾性而言，党争从根源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毕竟只要存在权力和利益的争夺，就存在党争。从太宗朝的褚遂良与刘洎开始，党争就已初现端倪。玄宗朝的党争，如李林甫、李适之，张说、张九龄和宇文融、崔隐甫，在皇权可控制与调和的范围之内继续着。代宗、德宗朝，党争亦不消停，“建中之初，山东向化，只缘宰相朋党，上负朝廷，杨炎为元载复仇，卢杞为刘晏抱怨，兵连祸结，天下不平”^⑥。顺宗朝，“永贞革新派”与反对派之间的斗争范围日益扩大，王叔文集团内部也纷争不断。宪宗朝出现了历史上最著名的“牛李党争”。学术界一般认为“牛李党争”起于宪宗元和三年，持续40余年，随着李党首领李德裕被贬崖州、死于寓所而告终。文士

① 刘昫：《旧唐书》卷十一《代宗本纪》，第181页。

② 刘昫：《旧唐书》卷十三《德宗本纪下》，第271页。

③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七《顺宗本纪》，第130页。

④ 杨伯峻：《孟子译注》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4页。（后文同此版本）

⑤ 朱子彦，陈生民：《朋党政治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页。

⑥ 刘昫：《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九《韦处厚传》，第2848页。



们有的积极主动参与其中，有的被迫无奈牵涉其中，但都普遍性地无法置身事外，这无疑会影响到他们的政治前途、思想与精神的世界、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矛盾复杂、多种可能性充斥、不断变化的人生历程中，他们必须对他们的身份认同做出选择，无论是在社会身份上，还是在自我思想认同上，抑或是在文化身份上，这是中唐这一特殊的时代赋予他们的命题。

经过中唐的过渡，中国封建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个转折对文士的思想、心态、创作、价值取向、审美趋向、命运等诸多方面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他们开始寻求失落后的归属问题，开始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笔者没有利用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去阐释，也没有充斥着政治性的意识形态话语，而是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出发，希望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生成相对客观的意义的效应场。

盛唐成为一种记忆，留给中唐的只剩缅怀与追忆。面对诸多社会现实问题，文士们不能不因为原本应有的社会身份丧失或者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产生危机感，而他们又有迫切的身份回归的愿望。当然，在坚持他们身份回归的过程中，变化也在悄然发生，因此他们的身份认同问题在变化中又整合出新的面貌。面对中唐社会的重重困境，文士对自我应该怎样去定位？哪里是精神的家园？哪里可以寻找到安身立命的所在？生存的价值在哪里？继续生命的理由和支柱是什么？理想是可以去信仰的还是愚不可及的？在思索与探寻中将选择什么？问题层出不穷。

二、研究意义

中国传统的批评方式还没有能够从理论上得以建构，而国外批评理论的多元化却让我们应不暇接。“我们今天或许还不具备充分表述自己的根本问题、自己的价值观和自己‘存在的意义’的理论能力。这么讲不是悲观，更不是放弃自己的问题和立场，而是一种自我提醒：对当代学人来说，为中国问题和中国立场找到有力的理论表达，仍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使命。”^①

本书在跨文化的研究领域中，运用“身份认同”的视角立体式地观照中唐文士，力求在继承“和而不同”这一传统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往前推进一步。本书的议题不仅仅是比较文学学科中阐发研究的具体应用，它的研究价

^① 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前言》，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值更在于可以提供不同文化之间沟通的契合点，以期在承认“同中之异”的基础上做到“异中求同”，从而有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促进多元共存。

笔者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中唐社会的认识，更好地了解中唐是如何拉开了唐宋变革的序幕；可以使我们更加明确中唐时期作为社会转型期的特点；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唐文士在社会转型期所经历的思想、文学上的变化以及文化上的选择，而这些都以试图解决社会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身份认同可以为我们的研究中唐的文学问题、文学现象提供一个新的观察问题的视角。

三、文献综述

虽然在现行出版的论著、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可查询到的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中还没有出现对于“中唐文士的身份认同”这一课题的直接研究，但围绕中唐、文士、思想、文化、身份认同的相关研究成果和间接研究成果已经相当可观。对以往学者的研究做一个较为详实的梳理，并对它们进行长期、大量的阅读和积累，是笔者在本书中可以继续研究的必要前提。

目前学界关于唐代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厚：有的是对一些文化现象或重大文学事件进行阐述，有的是对传统文体（诗歌、散文、小说）的类别研究和对作家个体的个案分析，还有一些学者已经开始从思想、经学、文化方面思考问题。已经出版的学术专著有：陈弱水的《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①，葛景春的《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②，葛晓音的《汉唐文学的嬗变》^③，何寄澎的《唐宋古文新探》^④，李道英的《唐宋古文研究》^⑤，刘国盈的《唐代古文运动论稿》^⑥，马自力的《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⑦，

① 陈弱水：《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后文同此版本）

② 葛景春：《李杜之变与唐代文化转型》，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9 年版。

③ 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④ 何寄澎：《唐宋古文新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⑤ 李道英：《唐宋古文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⑥ 刘国盈：《唐代古文运动论稿》，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⑦ 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年版。



孟二冬的《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①，石云涛的《唐代幕府制度研究》^②，孙昌武的《韩愈散文艺术论》^③、《柳宗元传论》^④、《唐代古文运动通论》^⑤，唐晓敏的《中唐文学思想研究》^⑥，田耕宇的《中唐至北宋文学转型研究》^⑦等。辅仁大学胡正之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唐士人文化反省研究》（1997年），台湾大学兵界勇的博士学位论文《唐代散文演变关键之研究》（2005年），扬州大学贾名党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唐儒学与文学研究》（2006年），厦门大学刘心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唐文编年》（2008年）等也各出新意，值得借鉴。

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⑧与《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⑨，韦政通的《中国思想史》^⑩，潘桂明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稿》^⑪（隋唐五代卷）从思想史的宏观纵向角度涉及了中唐的思想状况。章权才的《惠能的宗教革新与唐宋之际中国传统思想的重构》从微观的角度指出：中唐时期惠能的宗教革新作为中国佛教史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件大事，“不仅导致禅宗在佛教界主流地位的确立，而且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思想的奠定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⑫。美国学者包弼德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⑬，美国学者本杰明·史华慈的《思想的跨度与张力——中国思想史论集》^⑭，德国学者阿尔

① 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 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孙昌武：《韩愈散文艺术论》，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④ 孙昌武：《柳宗元传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⑤ 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⑥ 唐晓敏：《中唐文学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后文同此版本）

⑦ 田耕宇：《中唐至北宋文学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⑧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后文同此版本）

⑨ 葛兆光：《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9世纪》，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⑩ 韦政通：《中国思想史》，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版。（后文同此版本）

⑪ 潘桂明：《中国佛教思想史稿》（隋唐五代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后文同此版本）

⑫ 章权才：《惠能的宗教革新与唐宋之际中国传统思想的重构》，《广东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第73页。

⑬ [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

⑭ [美]本杰明·史华慈：《思想的跨度与张力——中国思想史论集》，王中江，编，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后文同此版本）



伯特·史怀哲的《中国思想史》^①，日本学者岛田虔次的《中国思想史研究》^②等，则是从“他者”的视角来观照中国传统思想。

关于文士、士、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产生、发展、演变、分类等不是笔者研究的主题，前贤的研究著述精博丰厚。葛荃的《权力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③，何晓明的《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④，刘泽华的《先秦士人与社会》^⑤，阎步克的《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⑥，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⑦等可供研究者参考。

中国学者结合文学、思想、文化现实进行的关于 Identity 的研究，可以参考陶家俊的《身份认同导论》^⑧、《同一与差异：从现代到后现代身份认同》^⑨、《文化转化与文化认同》^⑩，王成兵的《当代认同危机的人学解读》^⑪，王宁的《文化身份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⑫，阎嘉的《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⑬，周宪的《文化研究关键词》^⑭和《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认同》^⑮等。他们的研究论证精辟、见解独到，可以避免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的

① [德] 阿尔伯特·史怀哲：《中国思想史》，常昶，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 [日] 岛田虔次：《中国思想史研究》，邓红，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版。

③ 葛荃：《权力宰制理性：士人、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社会》，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后文同此版本）

④ 何晓明：《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7 年版。

⑤ 刘泽华：《先秦士人与社会》，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

⑥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⑦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⑧ 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外国文学》2004 年第 2 期，第 37—44 页。

⑨ 陶家俊：《同一与差异：从现代到后现代身份认同》，《四川外国语学报》2004 年第 2 期，第 114—118 页。

⑩ 陶家俊：《文化转化与文化认同》，《解放军外国语学报》2009 年第 6 期，第 86—91 页。

⑪ 王成兵：《当代认同危机的人学解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⑫ 王宁：《文化身份与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建构》，《甘肃社会科学》2002 年第 1 期，第 3—6 页。

⑬ 阎嘉：《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江西社会科学》2006 年第 9 期，第 62—66 页。

⑭ 周宪：《文化研究关键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⑮ 周宪：《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认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后文同此版本）



不必要的重复劳作。时下对于 Identity 的研究，已经成为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化学等诸多人文社会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议题之一。

综观整个 Identity 的研究，笔者经过认真严谨的梳理、思考和总结，发现近年来国内研究存在着某种缺陷与误区：

1. 将“身份认同”作为学术时尚来追逐，随意编排一个题目来推演既定理论的正确性，忽略了中国历史问题、现实问题、学术问题的复杂性。有的研究者根本就没有了解概念，在没有充分准备而是一知半解的状态下，大量罗列引言，全是别人在说，自己却思维僵化无话可说。

2. 有的研究者将西方“身份认同”理论中的只言片语作为“自己”的结论与创新，并据此理直气壮地断言：“身份认同”只有在全球化语境中的现代性社会里才是一个议题。之所以做出如此断言：其一是有了西方话语的支撑，研究主体对已经出现的西方观点确信无疑，同时对自己的话语缺乏自信甚至是无能为力；其二是没有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问题意识；第三是没有开阔的理论视野和开放的学术胸襟。

四、论述范围界定

概念是学科理论建构的基础，亦是课题进行逻辑论证的基础，因而对研究中的关键词（中唐、文士、身份认同）进行概念及其论述范围的界定是有必要的。

历史学家通常以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 755 年）爆发的安史之乱作为分界线，把唐代社会历史分为前、后两个大的时期。而关于“四唐”的细致划分，则是研究唐诗的学者根据唐诗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而源起的。笔者在本书的研究中选取的历史文献资料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大多集中在安史之乱平息至唐敬宗李湛被害这一时期。之所以对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如此界定，是综合了以下因素的考虑。

公元 762 年，时为太上皇的唐玄宗与其子唐肃宗相继驾崩，肃宗长子李豫继承皇位，史称唐代宗，十月收复东都洛阳。公元 763 年正月，历时七年零三个月的安史之乱结束，即便有“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心理上片刻的欢愉和感动，然而战乱的无穷遗患仍然在悄无声息地蔓延，形成了一个不仅是有唐二百九十年历史上的断裂，而且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转折与中枢。



从皇位继承的角度讲，唐代的最高统治者的血统中有胡汉融合的成分，文化渊源亦含混融之因子，正统的儒家思想观念淡漠，从唐高祖到唐玄宗，至高无上的权力的取得无不充满了武力与血腥，中唐基本上是“长子继承”，逐步认同了儒家“立嫡立长”的祖制。其中“立长”是为了稳定政局，因为嫡子年龄太小，无力承载一个国家在躁动不安的年代的凝聚力。其中有兼嫡子与长子于一身的，如顺宗。宪宗最初亦是立长子为太子，然而长子早逝；次子品行不端，且生母地位卑微；第三子即后来的穆宗（宪宗长子比穆宗仅年长两岁），为宪宗元妃郭氏所出，从“立嫡立长”的角度讲，亦不属例外。公元826年唐敬宗遇害，皇权的继承也出现了偏差，中唐时期皇帝、后妃外戚、文武朝臣、宦官之间相对制衡的格局被打破。由此中唐结束，步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晚唐社会。

知识分子是“士”的现代称谓（两者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士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产生的一个特殊阶层，并且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士”这个概念又演变出了不同的内涵。笔者对本书中所提及的中唐文士的界定是：生活在中唐时期，活跃于当时文坛，有科举考试及第的出身，具备一定知识修养和文化艺术造诣，在政治理想上有所追求并有诗文传世的文士，以陆贽、李绛、裴度、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元稹、孟郊、张籍、李翱等为代表人物。

对于本书中“身份认同”这个翻译过来的概念，笔者更倾向于使用Identity，因为它在文化研究中可以兼具“身份”和“认同”的双重功能，而且这两者之间复杂交混密不可分。中文词汇“身份”在传统文献中被解释为人的出身、社会地位、身价等。“认同”的概念则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渐次出现在中国文学、文化、社会理论话语体系中。当Identity“指某个个体或群体据以确认自己在特定社会里之地位的某些明确的、具有显著特征的依据或尺度”^①时，它可以被解释为名词性的“身份”；当Identity用以指“某个个体或群体试图追寻、确认自己”^②身份的行为时，它可以被理解为动词性的“认同”。

任何概念都有其久远的历史渊源，Identity亦不例外。它是西方哲学

① 周宪：《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认同》，第4页。

② 周宪：《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认同》，第4页。